



从整体性视野理解恩格斯的哲学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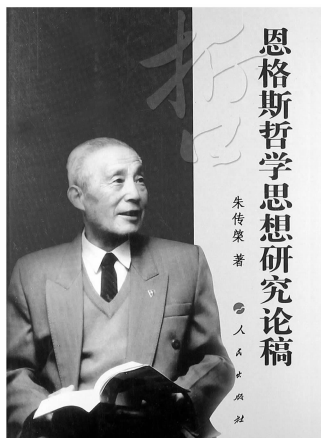
——读《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论稿》

韩庆祥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的关系成为人们研究的一个重点。“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由来已久。自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关系,一直都是伴随着“两个马克思”的讨论而出现的西方“马克思学”所研究的一个热点。国内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内的陆续译介,随着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重新理解,以及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讨论,国内学者开始集中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关系。

总体来说,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这一问题上,国内外大致有三种观点:“一致论”、“对立论”和“差异论”。“一致论”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之间的根本对立,明确宣称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当然,“一致论”也承认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在个人气质、知识背景、语言风格、理论分工等方面的差异和区别,但这丝毫不影响二者在基本思想和根本宗旨上的总体一致性。普列汉诺夫、卢森堡、列宁等人是“一致论”的坚决维护和捍卫者。国内不少专家也是持“一致论”观点。“对立论”首先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来,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对待自然辩证法的态度上是截然不同的。随后,法兰克福学派及萨特、施密特等人都批评恩格斯把辩证法实体化,变成了世界观,而马克思仅把它看成内在于历史之中的东西,自然本身并没有辩证法,只有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时才有辩证的运动。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如吕贝尔、费切尔、莱文等,也明确主张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的对立。国内也有学者持“对立论”观点,并从超验视野与经验视野、存在决定意识与意识决定精神、大写的真理与小写的真理、彼岸的自由世界与此岸的自由王国、个体性的分殊等方面阐述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学术思想上的对立。“差异论”的国外代表性人物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特雷尔·卡弗。他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一书中,借用恩格斯的话,提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谁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第一小提琴手”的问题,其结论是:恩格斯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小提琴手”。在这里,卡弗向我们敞开了认识并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即解释学的视角。他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问题是一个解释学问题,它依赖于评论者和文本、评论者和听众之间的对话,因而不可能得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唯一的标准答案。客观地讲,解释学的思路激发了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问题的再思考,而且,思考的问题域也随之扩大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本质,而不再局限于这一问题本身。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学者认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讨论,重要的并不是在这一问题上得出什么结论,而在于研究问题的过程,重要的是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和对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正确认识。武汉大学朱传荣教授也是“差异论”的主要代表。他新近出版的《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论稿》(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集中而系统地表达并阐述了这一观点,对我们重新理解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具有启示意义。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具有本质上的相同性。即二者在哲学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是根本一致的,即都是在理性原则影响下,把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他们哲



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把他们的哲学思想看作是行动的指南。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也具有非本质的差异。即二者的分工、侧重和贡献有所不同,哲学思想也各有特点。一般来说,马克思侧重于哲学的创立和明确表述,恩格斯除参与创立工作外,则侧重于对哲学的补充完善和系统阐发;马克思侧重于研究社会历史领域的辩证法,恩格斯则对自然领域的辩证法有更多的研究;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存处境与未来发展前景给予更多的思考,恩格斯则更多地研究人所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和社会;马克思走的是由一开始注重哲学而后来比较注重经济学的思想历程,而恩格斯则是由一开始注重经济学而后来比较注重哲学的思想历程,如此等等。本书还认为,在晚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分别在各自不同的方面补充、完善、丰富和系统阐发新世界观。1871年之后,马克思主要是致力于《资本论》的写作,把眼光转向东方社会,较为集中地探讨以农村村社为标志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论来深化唯物史观,而恩格斯的哲学活动主要是不断完善新的世界观,把以前强调不够的方面强调出来,运用对原始社会的研究成果来进一步完善唯物史观,论述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研究自然辩证法。

第三,正因为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存在着差异,所以,本书集中而系统地研究了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及其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关于这一点,过去我们的相关研究却有所忽视。本书全面阐述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影响,深入论述了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杰出贡献,以及恩格斯对自然观、《资本论》、社会主义学说的贡献和对实现马克思“遗愿”的贡献。

第四,本书还从整体性的新角度系统研究了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书信,认为它不仅补充、完善和丰富了唯物史观,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国际工人运动当中获得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共产党宣言》成为了许多“国家的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但伴随着这种传播,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歪曲、误解甚至攻击的现象也开始出现。1890年,德国莱比锡大学历史学教授、德国哲学家巴尔特指责马克思主义是只重视物质生存方式之决定作用的“经济决定论”,没有看到政治和思想的反作用。这实际上就提出了如何看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问题。同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的政治团体“青年派”,其思想领袖恩斯特等人将马克思主义歪曲为具有宿命论色彩的“经济唯物主义”学说,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由经济必然性所完全自动地生成的,丝毫没有人的参与,马克思主义忽视了“革命热情”的社会历史作用。这实际上提出了历史发展规律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关系、唯物史观的作用问题。在这一时期,俄国民粹派思想家丹尼尔逊等人向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关于俄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问题,询问俄国是否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涉及唯物史观的普遍适用性问题,也是关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面对这些歪曲、指责与询问,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之一,作为在马克思逝世之后直接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精神领袖和思想导师,自然负有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真实而进行斗争的历史任务,担负有为唯物史观进行辩护和正名的历史使命。1890—1895年间,在恩格斯写给布洛赫、博尔吉乌斯、施米特、桑巴特等人的大量通信当中,针对由这些错误的歪曲指责所造成的人们的思想混乱,特别是给党内青年人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恩格斯正面阐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关系的思想、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辩证统一的思想,从而对巴尔特、恩斯特等人对唯物史观所进行的歪曲和曲解进行了明确的驳斥,揭示了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和辩证内涵。这里,我们一定要把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贡献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作完整的理解,即注重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体现出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完全朝着“整体性”的目标而自觉追求、成长和发展的,这就体现为由不完整走向完整的历史过程的整体性或发展的整体性。这样的整体性在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集中体现出来。理解这样的整体性,应当把马克思的著作、思想与恩格斯的著作、思想统一起来。综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思想,我们发现:早年马克思为了反对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格外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而恩格斯针对当时德国青年派和某些历史学家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历史观的歪曲,在晚年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比较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历史规律与人的主体性的统一”、“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显然,早年马克思和晚年恩格斯是在其思想发展进程中体现出统一的整体性,应当作为发展的统一整体来理解,因而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割裂开来,否则就不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晚年所做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就是为了体现他们理论学说的完整性、防止人们的误解和曲解而展开的。我们只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深度耕犁,就会在原本(“底板”、“足本”)的意义上最大限度地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形象,就会澄清刻意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假象。

最后应当指出,差异论的实质是整体论,即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哲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具有本质一致上的整体性,我们应在这一整体性的基础上,来理解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哲学思想上的差异。